

●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 第六十辑

旧上海的金融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 第六十辑

旧上海的金融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 编

F832.751

责任编辑 李定锷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旧上海的金融界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

编 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常熟新兴印刷厂
(上海绍兴路5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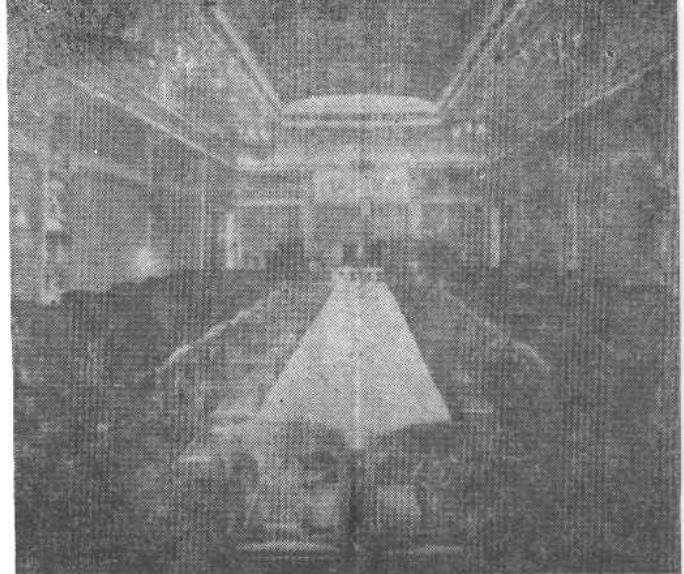
发 行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8年8月

ISSN 1000—6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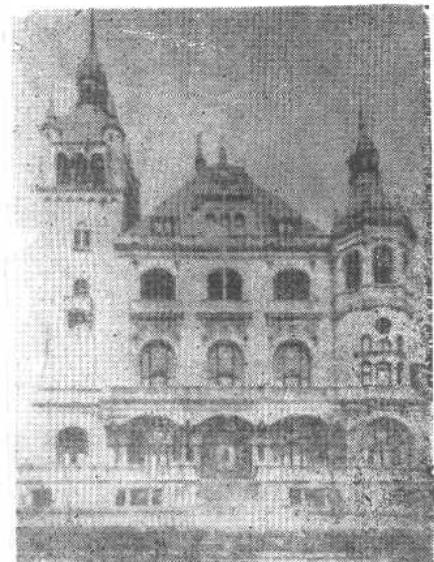
国内统一刊号CN31—1229

定价 4.4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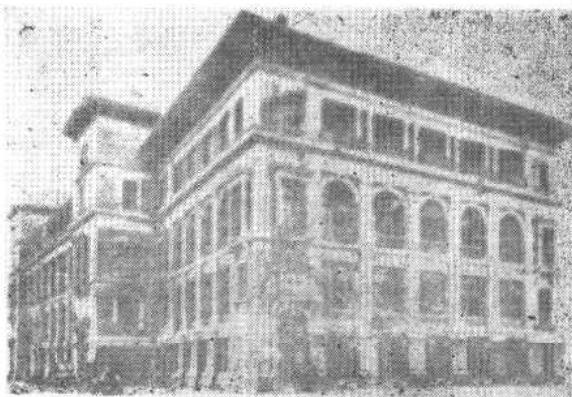
上海银行公会会议厅



上海中国银行早期行址



上海交通银行早期行址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会议合影(1920年)



宋汉章



张嘉璈(公权)



钱永铭(新之)



胡祖同(孟嘉)



盛竹书



徐陈冕(寄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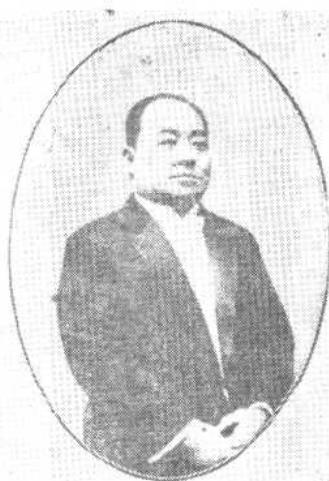
李 铭(震荪)



陈辉德(光甫)



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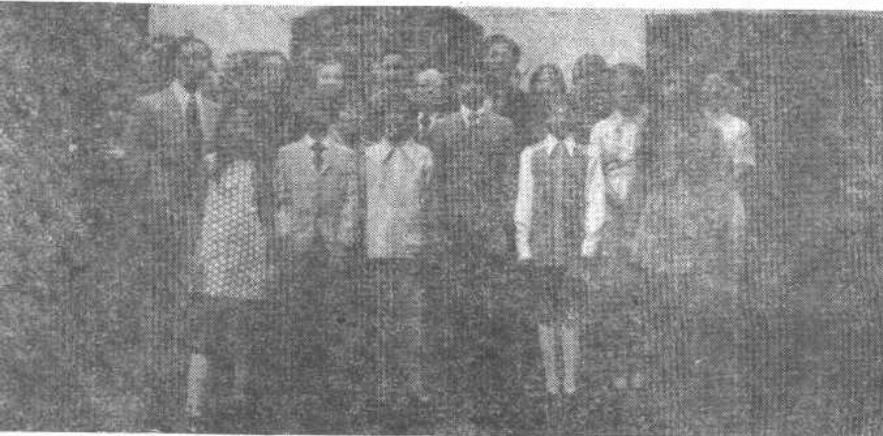
谈荔孙(丹崖)



王志莘



朱博泉近影



王怀忠(伯元)及在美家属合影

编辑说明

一、旧上海的金融业在我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有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可供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借鉴，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可以引为教训。按照文史资料工作向专题化系统化发展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我们编辑出版了《旧上海的金融界》这本专辑。

二、本辑所收稿件，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和上海市金融业党史资料征集组帮助组织，许多作者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盛慕杰同志在百忙中为我们写了综合性论述，并审阅了大部分稿件，提出了不少修改补充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三、本书征集的稿件不够全面完整，希望知情人士积极写稿。对本辑内容遗漏讹误之处，欢迎补充订正。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1987年12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旧上海金融业综述 盛慕杰(1)
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 李立侠 朱镇华(33)
宋汉章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陈安性(56)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 洪葭管(64)
上海交通银行史实片段 韩宏泰(82)
邮政储金汇业局二十年 陈述曾(94)
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 盛慕杰 朱镇华(107)
叶揆初传略 盛慕杰(116)
徐寄庼生平事迹 朱镇华(121)
浙江实业银行 马炳荣(126)
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及其经营特点 张继凤(141)
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 吾新民(153)
金城银行简史 徐国懋 邵怡度(161)
侨商中南银行 刘效白(172)
谈荔孙与大陆银行 於以震(180)

北四行的联合经营	应永玉(187)
中国通商银行始末	陈泽浩(194)
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	孙鹤皋(203)
刘鸿生创办中国实业银行	方祖荫(210)
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简史	於以震(217)
记先父王伯元	王念祖(221)
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片段	阮秀堃(238)
我在江苏银行的五个年头	陆子冬(242)
在上海的苏州程家钱庄	程庸畴(251)
旧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	吾新民(261)
回忆中国保险公司	王化南(267)
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公司	王伯衡(281)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龚汇百(294)
朱博泉与上海票据交换所	张森声(305)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邓华生(319)
中国征信所始末	吴嘉年(346)
附：本刊已发表的金融史料目录	(352)

旧上海金融业综述

盛 慕 杰

旧上海金融业是比较复杂的事物。从资本结构言，有旧式的典当、钱庄、票号等，大体上采取独资或合伙的组织形式；有新式的银行、信托公司、金融性交易所、保险公司等，一般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从国别属性言，有本国金融机构，有外国投资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由于资料缺乏和已有资料的未经系统整理，难以对旧上海的金融业作全面的论述，只能从几个历史阶段概述其发展过程。

自鸦片战争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旧上海金融业经历了清政府后期、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标志着它从萌芽到成长，由发展、兴盛到衰落、削弱的过程。由于资料的不平衡，本文对清政府后期作较详细的叙述，对后两期就重大事件略作分析。

一、清政府后期(1840—1911年)

清政府后期是指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至辛亥革命成功，宣统逊位的历史时期。在这70年间，上海的钱庄由明末清初的萌芽发展到成长，票号由兴盛而衰亡，外国银行因国际贸易的增长而日益扩张，本国银行则在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的形势

下逐步兴起。

(一) 上海钱庄的发展与业务概况

1. 上海钱庄的起源与变化

上海钱庄业始于何时，缺乏确证，但据有关资料，当在明末清初，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已有一定发展。其根据是：(1)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已有“钱肆”(钱庄的一种名称)，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2)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上海钱业中人集资购置城隍庙附近的“内园”作为钱业公所，据清嘉庆二年(1797年)内园钱业公所碑记，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776—1781年)上海钱庄有18家，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元年(1786—1796年)有64家，碑文残损无法识别的计24家。一种行业有行会组织，表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上海的钱庄原来集中南市，1843年开辟租界后，才有在北市开设的。1853年小刀会起义，南市钱庄受战事影响而收缩，逐渐趋向北市，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北市钱庄得到进一步发展。太平天国后期，各战区豪绅官僚等移资寓居上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国内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少数军事工业兴办，外国银行和票号先后进入上海，这些情况为上海钱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873年(同治十二年)上海有钱庄123家，达到以往历史上的最高峰。

1874年后，对外战事频繁，上海钱庄在金融经济不稳定的状况中度过，有所收缩。1903年起，江海关税收常年约200万两，各省关汇解赔款因先收后支，每月约沉淀600万两，均分存钱庄生息。加上票号存款与外国银行拆票，上海钱庄因周转资金充裕而

重又发展，1908年达115家之多。但1910年发生“橡皮股票”风潮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少钱庄倒闭，幸存者仅51家。兹据有关资料，将这一时期上海钱庄家数统计如下：

年 份	南 市	北 市	共 计
1858	—	—	70
1873	50	73	123
1874	20	38	58
1876	42	63	105
1883	23	35	58
1885	—	—	70
1886	31	25	56
1888	25	37	62
1903	23	58	81
1904	26	62	88
1905	30	72	102
1908	37	78	115
1909	23	77	100
1910	17	74	91
1911	14	37	51

① 1910年上海发生的一次金融风潮。1908年，外商宣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创设橡皮公司，大事招股，并暗抬股票价格，使之不断上涨。麦加利等外商银行承做该项股票押款，中国商人及居民竞相争购。至1910年7月，幕后操纵者乘高脱手，潜逃国外，外商银行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前做押款，一时股价猛跌，钱庄倒闭多家，商人和居民受害，形成一次金融风潮。

2. 上海钱庄业务概况

(1) 庄票的运用。庄票是上海钱庄发出的信用货币，在国内外贸易上起支付手段的作用。由于庄票有信用，外国商人也同样收受，1862年3月1日，一家英国洋行曾在《北华捷报》刊登广告，表示愿意接受“任何一家当地钱庄庄票”。为了维护庄票信用；1863年3月7日，上海钱业公所在《北华捷报》公告，自同治二年正月开始，凡钱庄没有加入钱业公所者，所出庄票概不收用，这就更加得到中外商人的信任。

(2) 工商业放款。上海钱庄主要对商业放款，19世纪前后，有些大钱庄对从事南北货运的沙船业放款；一般钱庄则以10天或20天的庄票，对棉织品等批发商和鸦片掮客予以资金融通，期内还款的利息较低，期外还款的月息高达8—10%。工业放款主要对象是纺织、面粉、榨油、火柴、水泥等行业。放款有信用与抵押两种方式，押品大多为丝茧、花纱布等。

(3) 洋厘投机。上海市场零星交易用银元，大宗交易按银两计值，每一银元约合纯银0.72两，在折算银两时，按供求关系在0.71两至0.73两之间涨落，业中人称为“行情”，因行情的变动至厘位为止，故银元的市价就叫“洋厘”。洋厘因农产品季节、进出口贸易淡旺和银根紧俏或松弛等原因而涨落，钱庄预测商情变化，时而多存银两，时而多存银元，以收取进出差价牟利，甚至从事买空卖空、控制行情等投机活动。

(4) 拆票。上海钱庄的资本大都不充裕，一般为2万两，而放款数额很大，资金来源大多依赖外国银行的临时贷款，称为拆票，亦称同业拆款，通常两天一结，可以随时要求归还。每庄拆进款最多的约30万两，最盛时各钱庄拆进总数曾达1300万两。因拆票

较多滥行放款的，一遇金融紧俏或金融风潮周转不灵，往往倒闭。

(5) 资产负债情况。钱庄营业向来不对外公开，现据搜集到福康钱庄(1894年创设)和顺康钱庄(1905年创设)的资料，可见一斑。这两家钱庄资本均为2万两，前者1896、1900、1903、1907年的存款平均约47万两，放款约57万两，后者1905—1911年存款为32万两，放款约63万两，其资金运转情况列表如下：

		福康钱庄	顺康钱庄
年份		1896—1907	1905—1911
存款来源	股东	5%	2%
	私人	40%	25%
	机关	27%	20%
	工商	29%	42%
年份		1902—1907	1905—1911
放款形式	信用	53%	
	抵押	47%	
年份		1896、1900、1903、1907	1905—1911
存款对资本的关系	最高	40.8倍	26.8倍
	最低	5.2倍	7.7倍
	平均	23.2倍	16.2倍
放款对资本的关系	最高	52.0倍	49.4倍
	最低	6.7倍	22.7倍
	平均	23.3倍	31.3倍
放款对存款		121.4%	192.2%
放款对存款和资本		116.4%	181.9%

(二) 票号的发展与衰落

1. 票号的概况

票号是从事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始于何时，尚无定论。19世纪20年代，票号已成为遍及全国专营汇兑的金融行业，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的票号是著名的三大帮，称为“西帮”。清末又有非山西人所设票号，称为“外帮”或“南帮”。

上海的汇兑事业，在16世纪中叶即已萌芽。嘉靖中，华亭人徐阶任内阁大学士，当时松江府赋税，先就地交入徐宅，而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府，然后缴库。明末，上海的商品经济开始发达，山西、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商人，挟资万两、数万两或数十万两到上海收购商品，不一定都携带现钱，有的是通过汇兑来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思宗曾下令户部鼓励“兑会”，在一地付款，凭票至另一地取款。有人说徐阶的转汇京饷，是中国近代汇兑业的开山祖，那末汇兑业似乎先源于上海，而不是山西了。

19世纪前半期，日升昌、蔚泰原、日新中、广泰兴等票号在苏州设立机构。1884年1月12日《申报》称：“昔日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据现有资料，在此之前，1867年日升昌可能已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1875年上海的山西票号共有24家，1879年正式创建汇业公所，以后陆续设立了10余家。19世纪60年代以后，南帮在上海新组织了若干票号，著名的有胡光墉的阜康(1863年设立)，严义彬的源丰润(1882年设立)，李经楚的义善源(1895年设立)等。

2. 票号的业务

上海最早的票号，西帮和南帮侧重点略有不同。西帮以买卖全国通商口岸的汇票为主，并收受定期存款，但不向一般商人放

款，仅对有信誉的钱庄作定期透支，总数约二三百万两。这种透支带有冒险性，市场情况稍有变异，即收回款项，以避免损失。有时还对官吏贷款，以供应他们上任前的必要费用，并承汇解缴北京的税款，或向上海汇兑各省分担的战争赔款，与清政府的关系密切。

南帮票号中的阜康、源丰润、义善源在上海即为汇划钱庄，分支机构阜康 8 处，源丰润 17 处，义善源 24 处。该帮在汇兑上与西帮无异，而存放款业务则与钱庄相似。

3. 票号的衰落

上海南帮票号首先衰落，西帮继之。其中，阜康是胡光墉（雪岩）所设，在各省有分支机构及联号，吸收公款与达官贵人私蓄。胡利用此项资金，大量收购茧丝，以供出口，但丝价操纵于外国，竞争失利，而上海市面银根日紧，阜康无力支持，于 1883 年倒闭。源丰润因 1910 年橡皮股票风潮中正元、谦余、兆康三钱庄亏倒的余波，以及各地金融紧缩影响，存款支尽，放款难收。当时严义彬致江苏巡抚电中即称“坚持三日，仍难补救”，“唯有停止收解，清理归结”。义善源是合肥李氏家族与苏州洞庭东山席志前合伙开设，交通银行总办李经楚为该号总司理，受当时源丰润破产影响，加上交行要义善源清偿往来帐款和抵押借款共约 287 万两，该号无法应付，于 1911 年倒闭。

辛亥革命发生后，上海市场人心惶惶，各业疲滞，银行、钱庄被挤提存款，外国银行又紧缩拆票，最后山西帮票号也停业清理。从此票号退出中国金融舞台。

（三）外国银行进入上海

1. 外国银行设立概况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商人曾计划在中国设立银行，未能实现。